

新世纪20年中国散文诗的审美追求

张翼

(福建警察学院基础课教学部, 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 新世纪20年中国文学创作已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散文诗作为新文体在中国历经百年的探索积累, 终有一些崭新的审美要素发生, 逐渐树立了文体品质和自信。近20年来, 散文诗通过修辞能力激增、题材扩容、民族特质的显现以及对真正强力精神结构的召唤, 反映现代社会的多重文化特征和心理症候, 呈现国人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芜杂、微妙。重审散文诗创作得失, 意在反思当前诗歌创作的整体情况, 为散文诗创作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和形式资源。

[关键词] 散文诗; 审美追求; 诗性回归; 中国气质; 多元融合

[中图分类号] I 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4-0076-09

概述新世纪20年中国散文诗的创作状况, 笔者并非自信能清晰勾勒出20年来散文诗的发展脉络和审美走向, 而是为了探讨一定历史阶段某种文体的发展流变与意义指向。行文目的在于通过回顾过去的成绩给出可能性的判断, 在比较之前创作的得失后, 努力描述当下散文诗创作的纷繁状况, 力求勾勒当前中国散文诗写作的审美新变和未来的可能性。笔者的描述不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宏观叙述, 只是在尽可能多地阅读近20年发表作品的基础上, 以个人的感知尝试归纳出散文诗发展的审美态势, 为读者提供一些诗学参考。

一种文体的困境往往隐含了文学的总体困境, 一种文体写作的突破亦可视为文坛发展的某种突围, 尤其在网络影像普及的年代, 文学的社会学想象力已日趋平淡, 消费时代的到来使纯文学更加边缘化, 任何写作向度的进步都值得关注和期待。散文诗的自觉倡导和创作始于五四时期, 其文体归属学界展开过不少讨论。本研究采用谢冕、王光明等理论家的主张: 散文诗是新诗中的一种独立文体, 是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抒情文学样式, 化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 “从本质上看, 它属于诗, 有诗的情绪和幻想, 给读者美感和想象, 但内容上保留

了有诗意的散文性”^[1]。中国散文诗创作历经百年的探索与积累, 确有一些崭新的要素发生, 一些优秀的作品可作为鉴照存在的镜像, 树立了文体品德和自信。新世纪以来, 散文诗通过修辞能力的激增和创作视角的扩大以及对真正强力精神结构的召唤, 反映出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和心理症候, 呈现出当下生活经验和精神世界的芜杂而微妙的立体景观, 把握和呼应了时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其审美探索大致可归纳为以下3个方面。

一、诗性回归: 语言的锤炼与诗艺的提升

新世纪的散文诗并不是诗学意义上的开端, 而是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以来散文诗发展的延续。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中国散文诗的创作发展和理论批评日益走向自觉与多元。写作题材由即景式的“小感触”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虽然不少散文诗还存在口水化、散文化的倾向, 但越来越多的作者立足当下生活, 深耕诗歌艺术, 追求个性风格。散文诗不是雕琢词句的押韵散文, 而是内具哲学精神的诗歌。愈来愈多的诗人意识到此种诗体的美学特质和文体要求, 开始注重外在节奏与内在情绪的诗

[收稿日期] 2022-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资助项目(20&ZD284)

[作者简介] 张翼(1975—), 女, 福建福州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性融合；专注于语言的探索，深入个人直觉，以坚硬话语刺穿潜意识或存在的边界；建构时代感的新鲜意象，使其具有象征的暗示性和审美的现代性。

201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了“我们·散文诗丛”系列的十几部散文诗集，得到文学界的广泛认同。以女诗人为例，有弥唱的《复调》、转角的《荆棘鸟》、贝里珍珠的《吻火的人》、水晶花的《大地密码》等散文诗集。在这些作品中诗性的复归得到多样化的丰富表现。语伞的散文诗以长篇为胜，假若不以外在的语言节奏配合内在的诗情，容易导致诗性缺乏，类似散文。散文诗要提炼诗意，注重诗技，才不会与散文混淆。语伞在散文诗集《外滩手记》里，通过长短句、停顿、空行、语调以及复沓、对称、并列等手法，使外在语言的节奏契合内心情绪的流动。语言节奏是诗的外在形态，情绪的节奏是诗的内在构成，没有节奏感的诗终究没有生命力。兹引用《外滩，或者光》的部分段落：

外滩从不膜拜沉默——

适时选取白云低垂的方法耳语。

波浪般扩散的指纹里储备着太阳神秘升降的行踪。

用修长的身体抵达岁月深处，否定一切黑暗和废话。

在这个城市打拼的人，如果身心受伤或局部痛苦，外滩就是阿司匹林。便捷，且疗效显著。

而我对外滩的爱，可以医治我对生活的恨。

石库门里的日记本，纸面发黄，字义难解。旧上海的传奇或秘密，早已深埋高楼的深渊。今天，人们出行之前发送一条袒胸露背的微博，似乎立即弥补了遗憾的漏洞。

同时，近视眼和人性的弱点一样，越来越多；因为雾霾的内忧外患，带上眼镜仍然看不清真正的远方^[2]。

城市作为现代化最重要的社会化形态，成为诗人凝视与反思的对象，也是居住于此处诗人的外在生活的重大现实。外滩是语伞都市生活与文学实践的镜像，是诗人与世界交谈的重要对象。外滩是光的磁场，吸引无数追梦人的脚步，见证无数生命的在场与离场。尽管多数人都存有逃离大城市的冲动，但城市生活依旧是现代人无可回

避的顽强存在，“城市已经内在于我们，我们需要做的是，我们是否能够发明足够有创造力的文体和语言，来形塑我城、你城、他城——最终的标准也许是，由此建构出来的美学，恰好能够颠覆掉那个景观化的平面的‘伪发达资本主义时代’”。^[3]都市生活已是无时无刻的日常，而现代汉诗中城市意象并不常见，深入人心的都市诗歌数量有限。语伞将文学触角伸进城市的各类景观，对现代化乃至后现代的景象“高楼”“小区”“电梯”“微博”“网络”等开掘提炼，上升为立体的艺术感觉，塑造出诗歌情境。在《外滩，或者光》中，语伞诗意撷取上海生活的片段，映照出社会精神的侧面，引发对整个现代性的思考。诗人没有武断地把城市生活归为万恶之源，以女性的细腻敏感与诗人的大胆想象将现实处境与精神状态裸裎，温和而平静地观看自己与他人的生活，展开自我和他者、世界的对话。语伞让读者看到都市生活中内心的空虚迷茫，也感受到现代人精神的抗磨损性，提供面对都市的独特立场，以诗歌回应社会对文学的召唤，如同爱默生呼吁的那样，一个时代的经验需要一种新的忏悔，这世界仿佛常在等候着它的诗人。时代需要艺术家对某些“有压抑感的现实”的关心和批评，诗人有能力对社会提出“有启发性的或有希望的怀疑”^[4]。

受20世纪90年代诗歌“口语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末散文诗的语言出现由“口语化”向“口水化”滑落趋势，导致诗性的流失。新世纪以来，一些作者自觉回归散文诗的诗性特质，追求语言的精炼、醇厚，创造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与象征。男诗人中耿林莽的《草鞋抒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方文竹的《深夜的耳朵》（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彭燕郊的《漂流》（花城出版社，2010年）、黄恩鹏的《过故人庄》（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崔国发的《黎明的铜镜》（河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刘再复《散文诗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苏忠的《慢笔》（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这些散文诗集题材广泛，采取暗示、喻意、多义、重构等个性化处理，提升语言的增殖力和诗歌技艺。他们的作品结构多层繁复，呈现情景交融、心物相通的意

境,回环转折间展现内在情思,以艺术造型的力量承载新世纪的生活内容,烛照现代伦理困境。灵焚的散文诗集《女神》(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采用变形、陌生化的手法,以象征为主要表现方式,在意象性细节和整体隐喻里展开叙事,几句诗就涵容某种情节的完整和精神的寓意,让生临客观境遇产生的情愫在神性与哲学的观照下呈现生存之幻与生命之美。这归功于他万花筒般的诗歌语言所包含的一种幻想的能量,诺贝尔奖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认为:“诗的本质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5]

徐俊国作为画家诗人其散文诗集《自然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显示出强大的写实赋形和写意传神的功力。他在捕捉、再现细节上,具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艺术感觉,“月亮总是在最高的地方显现肉身。它让黑夜有了一颗皎洁的心”(《黑夜也有一颗皎洁的心》)。“从山椒鸟这边看过去,八月的鼻梁位于中景,微塌,不失陡峭。爬山虎经历了去年的裂纹,顺理成章地把生活观转向私密之处。世界的真相过于空旷,以至于看不清它的边界”(《生活观》)。徐俊国的写作视角另辟蹊径,在诗中常用拟物的手法展示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将人类与环境的矛盾形象、深刻呈现。他的《告示牌》初读让人忍俊不禁,“一对正在散步的草蜢,被一只突然踩下来的皮鞋活活轧死。……今天,在这里,太阳落山的时候,全体小昆虫将为草蜢举行隆重的葬礼”。随着诗句跌宕出现,心情愈发沉重,“各位游客,尤其是两条腿的游客:请回避或绕行。谢谢!”诗人辛辣嘲讽里,隐藏着作为人类对动物的歉意。徐俊国并没有把自己放在道德高地,而是将自我投放其中,对自身反思,对自然愧疚。诗人不仅尊重他者,也关心弱小的事物。《告示牌》流露着“辛波斯卡式”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讽刺,昭示了诗歌人类视角的限度与“非人类”视角的可能。诗人提示读者,如用动植物的视角,它们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徐俊国建立一个不同于人类视角的诗意世界,通过自我省思表现人类精神世界的困境与缺失,再现大自然的秩序和品德。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向现代

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徐俊国通过诗歌展示现代文明的某些文化症候,让读者看到在物质力量和工具技术中,人类逐渐傲慢自大,伤害自然的同时,也失去自我的灵性和皈依。

这种物化的视角,毛国聪、黄金明的散文诗集中都曾被采用,在骆英的散文诗集《小兔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九夜》(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中更是得到自觉而精彩的运用。无论是“小兔子”“蟑螂”“响尾蛇”“马”“猫”,都有着与卡夫卡笔下“甲虫”相似的隐喻和艾略特“荒原”的意味,有力呈现金钱奴役、伦理失范、欲望膨胀、丛林法则等现代都市之恶的主题。骆英大量使用的排比、反复、循环的狂欢句型生猛而贴切地讽喻着价值失衡、娱乐至死的时代。诗人先锋性的语言表达是站在当代人精神危机的立场,正是现代精神境遇的破碎、分裂造成了诗歌艺术的多种可能性。卡林内斯库指出:“历史地看,先锋派的萌生和发展似乎都紧密联系着现代非神圣化世界中的‘人’的危机。”^[6]骆英在《第九夜》中引进的各类型社会经验的符码和诗歌主体的复杂化充分实现了散文诗的文体可能性,自身也获得鲜明的辨识度。自然有灵,万物相通,敏感的艺术家的伤害、异化而感到痛苦、困惑。对宇宙万物的眷念和哀愍,构成诗人语言创造和艺术想象的来源,其内在依然是对人之可能性、完整性的人文主义话语的确认,这构成了与西方先锋性诗歌的区别。

无论采取何种题材视角和语言修辞,这些诗人都更加关注对人与物的微观知觉过程,像里尔克一样努力显现事物关系中的意识状态,固然很多还是弥散、分解的,但好过意识主体的分崩离析。这些散文诗集的出现,对以往散文诗过于口语化、散文化或美文化写作倾向适时予以纠正,通过诗歌技艺促进语义的复杂化和包容性,为诗语的表述确立一些范式,推动和促进了散文诗创作的诗性复归。有道是诗为心声,字为心画,诗歌广义的社会功能是维护和拓展民族语言的感受力,不屈服于强大的主流话语。从这个角度看,散文诗的诗性复归有助于抵制社会话语的不断空洞与僵化的趋势。

二、本土气质：丰富的民族元素和地域特色

20世纪90年代诗歌重在观察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和人性的变化，新世纪以后，更多的诗人从“语言学”转向中走出，反思全球化进程里丢失的文化信仰与精神家园的重建。耿占春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无论生活感受与历史认识存在多少差异，人们依然生活在相同的话语空间，分享诗人们所创造的意象与象征，共享诗歌中的感受、激情和理想。而到了21世纪，各阶层的社会感受和历史认知分解太快，已然从认知领域转向情绪化的对立，无法在相同价值观念与语义参考框架内交流。在社会方言（巴赫金）快速分化的当下，诗歌仍是一种可能性的意义实践，“在分化的社会心态中，在重构共同的价值观念之前，认同是以真实的感受、经验、记忆为基础的，而诗歌话语的重构亦是以此为根基的认知与情感的综合。对某种真实的内心生活的表现，在任何时候尤其是在价值观发生危机的时刻，依然是诗能够提供的最高的精神利益，或可能的救赎方式”^[7]。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日渐从热衷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转化为与西方文学建立一种互文关系。散文诗创作重拾传统文化要素，借助道家、佛学的视野展示在场经验的驳杂多样与民族特质，融合地域诗学与生态美学踏上精神返乡之旅。

亚楠、黄恩鹏、叶梦、陈计会、楚楚、皇泯等许多诗人的文本充满中国性的书写，显示散文诗多种成长的可能性，深具社会历史与文化诗学的价值。爱斐儿的散文诗集《非处方用药》涉及99种入药植物，每种都化为诗人对生命与自然最质朴的表现和象征，关乎肉体与灵魂病症的治疗。针对现代人出现的浮躁、麻木、空虚、荒凉等文化病症，诗人在《金银花》中对症下药：

牵手连翘、薄荷与荆芥，用春水一盞，煎盛夏八分，加诗酒半盞，在水深火热的生活里滚二三沸，热服，解世间温热虚浮表症。

以芳香率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组成五味消毒饮，调制金花银蕊的济世药汁，化孤独痼疽、寂寞肿毒、谎言疮癖。

注定这一生我只能以清风梳头，露水洗瞳仁，以普世心肠挥霍命中的金银，气血同清，三焦同治，用一味药的冷静覆盖灵魂的轻盈^[8]。

诗集对中草药意象进行现代诠释，涵容传统文化的资源后创出时代新彩。《天麻》《苦参》《金银花》《三七》《紫苏叶》等篇，构成篇篇独立而又兼摄整体想象的文本世界，在传统题材与古典诗性里注入现代审美因子，将中药的表层意指与人文情思深层勾连，以纯熟的诗艺在本草的叶脉上张举灵魂的纲目，谱写当代人的心灵图景与社会风貌。爱斐儿的医者专业与诗人追求在创作机制中得到完美结合：传统医学文化里的药性、药理与现代人的生命情感、社会意识熔铸，使其在时代背景中得到个性化的充分表达，拓展了创作素材与表现领域，个性化写作的同时又深具审美的中国性，实现独特性与普遍性统一。

罗长江的长篇叙事散文诗《大地五部曲》五卷本充满了民族元素和地域意象：金木水土火是其盛大华美乐章的主调。这部关于大地的颂歌，既是中国的，也是历史和世界的，谢冕认为其完成了一个传统文体的拓展与延伸：“引用《九歌》的构架，用新的九章祭奠新的国殇。鲜明沉郁的中国元素，成为交响乐曲中时时浮现的基本旋律。二十四节气，匹配着二十四首竹枝词，讲述一个村庄的二十四个故事，等等，随处可见构思的缜密和诗意的充盈。它的色彩是中国大地的色彩，它的音响是中国大地的音响，他的想象是中国大地的想象。”^[9]。吴谨程的“解读古典”系列与许淇的“词牌散文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活用古诗篇名、曲名、词牌，从历史典故着墨，文辞优雅，曲折有致。题目有“关雎”“春江花月”“虞美人·春花秋月”“念奴娇·大江东去”“钗头凤·红酥手”“天净沙·秋思”等，作品营造出极具中国符号的审美情境，流淌的虽是古风韵味，表达的却是当代人的情感与智思，唤醒这些古老的意象和词汇，焕发现代汉语的风度和气质。赵目珍的散文诗集《无限颂》（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漫溢着古典韵致，用12种方式打开了陶渊明，向古代圣贤和经典致敬，并以此与当下精神世界的矛盾对抗。陈计会的散文诗集《岩层灯盏》（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从盘古到遇罗克，选取57名神话和历

史人物进行创作,借助神话与历史题材对历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进行书写,对如何在专制中捍卫人的尊严予以思考,挖掘抗争中的英雄意识和理想力量,呈现一以贯之的华夏君子之风。还有语伞的《假如庄子重返人间》、唐朝晖的《中国瓷》、蓝格子的《节气书》、宇剑的《竹林七贤》等组章,都借助传统文化的不同要素,荷载现代人的意义追问,通过各自吟唱完成“意义的照临”。

苏忠的散文诗集《快意为禅》(团结出版社,2018年)借助禅宗视角,以恬淡的心、灵动的笔,与自我对话,为山水立心,感受万物生生不息的乐趣,实践体验审美,完成主体间性的美学。诗人以禅的境界去领悟自然,化身万物,与天地对话,语言温和谐趣,语调轻松舒缓,兴象玲珑,妙趣横生。在对自然的观察与体认中获取新颖感悟,在心斋坐忘中诗意栖居。海德格尔的理论体系中有一个重要的“栖居”概念,“栖居是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这也是极富生命美学意味的诗学命题。“栖居的本质特征是解放、保护”^[10],在天、地、神、人四方的亲密共在即世界游戏中获取“灿烂的感性”,使存在的意义显现。这与禅宗、道家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禅宗的洞见慧识使诗人观照事物时,获取对人生价值和社会关系思考的新维度。诗人以禅的空寂和内敛提醒自身与读者要自觉地对生命意义进行探询、证明,以禅意点醒生存的迷茫,借助禅——淡然而超越的视角,帮助人们还原世界本相,完成艺术家描摹个体独特感受、传递时代生命经验的职责。庞白的散文诗集《唯有山川可以告诉》(漓江出版社,2018年)有佛教、道家之风,有无为空无之蕴。左右的散文诗集《我的耳朵是一座寺庙》(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年)、潘玉渠的散文诗集《此间坐忘》(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年)等都借助宗教的视域观照生活,重新观察自我与社会。这些诗人不是面对现实的怯弱无能或对命运的低头妥协,也并非对世事消极躲避,他们追求静心自守和超越生活的文化品格,激活并见证当代精神的多种面向,让事物显现迥然不同的仪态,将存在置入作品。

全球化以来,文学的“同质化”日益严重,地域书写开阔了散文诗的题材与审美疆域,形成了多维而典型的诗歌文学场。此外,地域诗学对

加强诗歌时空的纵深感和精确性均有裨益。诗人们在丰厚的民族土壤里,以个人风格展现家园情怀。泉州诗人任剑锋的诗集《任剑锋散文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第一辑“眺望家园”里有着丰富的乡土意象,《母亲的锄头》《父亲的扁担》《农忙季节》《惠邑男儿》每首诗歌的题目都让人感到亲情依依,闽南乡土气息蓊郁。在浓浓的亲情与乡情里,透露出这代人的欢喜与哀愁。当代中国所赋予的种种生机和可能,吸引着他们的创业与致富的梦想,他们既是思乡人,也是离乡人,既是恋家者,也是出走者。贵州毕节徐源在散文诗集《阳光中的第七个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里,以穿青族人独特的情感方式抒发对故乡和大地母亲的眷恋与悲悯。从苗寨村子走出的杨胜应,以散文诗集《从内心出发》(成都时代出版社,2019年)为故乡苗寨吟诵立传。河南马东旭的散文诗集《父亲的黄冈镇》(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以浓烈的情感虔诚守望故园和亲情,努力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淳朴道德与工业文明中个人主体性确立有机融合,构筑华夏民族核心价值的精神共同体。新疆亚楠的散文诗集《在天边》(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通过卓越的语言能力,展现新疆瑰丽的色彩明暗和粗犷的线条质地,边民勃发的生命意识与西域自然互为表里,将恢宏雄奇的自然气势和浓重沧桑的异域历史摆在读者面前。还有藏族扎西才让的《七扇门》、布依族陈德根的《内心乡村》,青海陈劲松的《藏地短札》、云南莫独的《村里村外》等散文诗各自开拓地域写作的疆域,延伸诗歌地理的版图。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地域的民间色彩浓郁,各地诗人开掘民间文化,以智慧之思,萃取出既有地域民族风情又彰显自我个性的艺术符码和审美取向。彝族诗人吉狄马加,对故地精神的皈依和现代性文化的浸润使其诗篇具备多维的审美空间和人类意识的重构。陈劲松、王剑冰、喻子涵、桑园等不少诗人的文本都充满本土元素和中国意象,以生态美学的思考角度将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紧密结合,故土情怀被编织进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确认与覆盖全人类的人文关怀里。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新世纪以来散文诗生态美学的书写充实了诗

歌智性启悟的哲学内涵，具有前瞻意识，显示出作品的文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三、敞开经验：古典性与现代性的多元融合

纵观当代文坛，不仅诗歌创作，文学整体在丧失对重大问题的兴趣和发言能力，导致文学魅力的不断流失。部分原因是作者缺少对自我和社会的质疑和人类命运的深层思索，更主要的原因是世界日益繁复、隐晦、分裂，曾经让冯至焦虑的“泛滥无形”的现实如今更加泛滥，创作者缺乏把握和转喻“庞然大物”的信心和传达复杂内在的表现技术。理查德·谢帕德在《语言的危机》中通过分析语言的变化解释文学对现代社会进行描述与象征的困难，“现代语言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话语和文学话语之间的分离……他们不得不首先拆除传统世界的结构，并‘炸毁’语言，然后才能创造恰当的语言偶像”^[11]。现代诗人要在语言中再造一种形而上的语言，超越口语、书面语，甚至普通的语法，进入“另一种现实”。李健吾明确地指出：“诗人的现实是一种提炼，小说家抓住一切浮动的现象，但是，诗人静静在感受那永久深厚的味道和暗流，那美恶之所以为美恶的力量。”^[12]不论是西川提出的“知识分子写作”，还是于坚、韩东提倡的“民间写作”，诗歌精品的诞生，必然要走向有难度的意义化写作，思考并回答人性的真相、生命的意义、个体的自由、族群的信仰等关乎现代人生存真实和心灵走向的问题。

中国社会尚处过渡时期，各种形态矛盾多元，有破坏也有创新，有排斥也有包容。同时，地球村的出现，不同时空的东西在瞬间爆发、融合，错综复杂的现实境况和文化模式等待着文学做出新的描述和引导。诗歌要反映社会的复杂性和综合性，需要具备涵容历史与当代元素的写作弹性和精神体量。现代社会继承传统也突破传统，当代诗人在强化现代主义特征的同时，也对古典文学进行了重估与转生，运用灵活多样的组合方式来展露、揭示人类的生存环境，包括新的物质环境和精神伦理环境。杰出的散文诗文本，无论内容还是技术都是古典传统与现代美学的深

度融合，有助于内在复杂性的展开，回应多重分裂的现代经验。

新时期以来，不少诗人走向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窄化写作，在田园牧歌中逃避对社会现状的回应与评判，放弃了独立思辨和艺术创新。周庆荣认识到问题的症结：“上世纪大多数散文诗作品偏重美、灵动、描摹式的抒情。对于事物的外形的关注甚于本质的探究。”^[13]周庆荣的创作关乎当下生活，让理想精神获得现实指向。他在后工业社会文化模式中，依然葆有古典艺术的明晰态度，从2010年开始陆续出版了散文诗集《我们》《有理想的人》《有远方的人》《有温度的人》，这些诗集无不提醒读者，城市是多数人的居所，既然无法悬空出世，就不要总是企图离开喧阗之地，学会在城市里保持静默的心境，在人群中领受生命的意义，完成对生活真正的担当。“更伟大的自由”不是隐居山林，而是开放自我，融入社会，完成对现实的突破与超越。诗人拒绝革命的集体话语形式，也没有落入自我情感宣泄的窠臼，勇于呈现抒情主人公形象，发出主体明朗的声音，对合理的现实不吝赞美，对荒谬的现象彻底批判。周庆荣的作品没有细密繁复的组织，词语也没有脱离传统文化语境的频繁移位，坚持清新而确定的抒情方式，化繁为简。《沙漠上的烈士》用质朴的意象和平静叙事让寓意展现：“我踩过人间三千里起伏，站在死去的胡杨的身旁……认真的活，勇敢的死。然后，自己是自己的碑。”^[14]古典理性的抒情穿过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坚定地走向所指，重构英雄式主体，塑造现代人格的典范。周庆荣对现实和理想的坦诚为诗歌重回朴素真实、宏大广阔的古典境界提供了现代文本参照。古典也是表达现代的手段之一，古典性已内化为我们固有的诗学传统，语言无所谓新旧雅俗，关键要与诗人的情思和谐共鸣。

许淇、耿林莽等老诗人是较早将城市题材书写引入散文诗的实验者。作品的现代性，不仅在于材料的选择，更在于观察的角度和表现的技术。林登豪的散文诗集《折叠：都市与山水》（团结出版社，2018年）对城市生活景观展开“审丑”的诗美追求。诗人尝试建立都市话语抒情系统，展示现代人的生命疼痛和生存悖论，这

是散文诗对现代性深层书写的有效尝试。《打工妹》中,林登豪展示消费主义如何用幻设的美好生活无声地将打工者的青春和生命榨干。现代性不仅是客观意义上的历史巨变,更是现代人对于自我生存境遇的切身体验,即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感的真实体悟。耿林莽的《窗口鲜花》《手的档案》,赵宏兴的《工地上》《拾垃圾的人》等散文诗都是对底层的普遍关注,对现实忧患和草根命运的悲悯。这些诗篇亦攸关中国的未来,具有为底层立言和历史证词的价值以及艺术创新的营造,它们生发于现代工业文明,一如田园山水诗之于农耕时代。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与变革带来的阵痛更集中体现于底层,这些书写有来自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也有来自打工群体内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自《诗经》始,到两汉乐府,再到白居易新乐府运动,以至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人的创作,无不是对其精神的继承和发展。陈德根《打工:一个疼痛的词语》述说着打工人的底层悲哀:“浪迹天涯,一个词语在生活锋利的刀口逗留。体内的铁,面容清瘦,纷纷从暗处走出。锈,铺天盖地,无孔不入。一个始终沉默的人慢慢地弯下腰,捂住胸口。一个词语哭喊着,从方言的阴影里出走,呼儿唤女,背井离乡。”^[15]过去的几十年,农民工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制造者,现实生活中却长期被边缘、被漠视。他们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佳作直指人心,但这些诗歌被忽视和低估,文学史的主流叙述难觅踪影。这些诗作完整、贴切地表达了他们打工的经历和感受,诗艺可能不够高超、完美,却是中国社会深处最真实的经验和情感。郑小琼的散文诗集《疼与痛》(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善于抓住有质感的日常细节,不作普通的倾诉或宣泄,而具有本雅明所说的某种现代性的“文明的寓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超过我们的想象,任何诗人只能感知或想象某些部分,反映社会生活或本质的某些方面。黑陶的散文诗《一个关于中国的隐喻》(八章)展现一种朴素、强健、积极的民间生活。当樟树遭受钢锯的摧残:“薄厉的钢铁在鲜嫩的肉躯内肆意挺近……

欲望的钢锯迫不及待地揭开优雅的面具,亮出所有的狞蓝牙齿”,经历砍伐“溅射于空气中的树血,在光洁的早晨肌肤表面正缓缓下淌。”^[16]在这些惊心动魄的诗句中,读者想必感受到植物的切肤之痛。黑陶与徐俊国不同的是没有流露对自然的愧疚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讽刺,而是转向对植物自愈能力的钦佩与不屈精神的赞赏。樟树遭受劫难后,气味更加清冽,生命更加顽强。我们的民族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后,顽强地从废墟和伤口中重新站起,以崭新、博大的精神面对现实、拥抱世界。黑陶的散文诗展示出乡村生活的沉重与美好,劳作的朴实厚重与闲暇的浪漫轻盈共同构成古典的审美情趣。乡村在维护本真的同时又要赶上时代的发展,苦难中的尊严,古老里的焕新,随着传统意象和民间典故的巧妙嵌入,我们感受到民间精神溃败里的强韧,达到某种比直接诉诸于事实更意味深长的真理。

诗人要活在当下,在切身感受中激发与历史、时代和存在等重大议题对话的能力,通过作品重建他们守护和希冀的世界。这让我想起许多熟悉和不熟悉的诗人,彭燕郊、刘再复、李耕、梁小斌、陈劲松、李松璋、王猛仁……他们的散文诗能跟坚硬的现实发生强烈的摩擦,触及真正的历史逻辑,激发读者内心深处的尊严和灵性。李仕淦的散文诗集《旅行者》(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拥有深度的内向,触及形而下的个体困境和形而上的存在之思,展示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宏阔的精神取向,其磅礴的激情和融通中西的诡谲想象让人惊叹,其现代性的属性与意义不可低估。章闻哲的散文诗集《在大陆上》(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跋涉到文学的高寒地带,对神性、罪过、救赎等问题展开严肃探索,忠于个人的发现,锻造强大精神主体。她对体式优长的精准把握实现了对文体品质的锤炼与提升,其主体性的自觉与思考深度以及运用复杂的象征语义的能力实现罗兰·巴特意义上的“可写的文本”。灵焚的散文诗集《剧场》(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穿透生存的表象,展现生命的真谛。他的哲学思辨结构了他的文学想象,写出“本体”的形而上意义的诗。《礼物》,这首与波兰诗人切·米沃什同名的诗题包含他对生命

状态和存在意义的积极思考和追问。灵焚思考主体如何在后现代电子化生存中安置自身，强调以自为主体精神重构自由选择的生命意志，这是存在主义向死而生的精神立场在诗中的传达。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主义的原子式自我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但自身也陷入“去历史化”的虚无中，本雅明认为“现代主义并没有提供英雄，这种类型没有用处。它把他永远拴在了安全港里，把他抛给了持久的懒惰”^[17]。灵焚对某种单一现代性秉持怀疑，他的“剧场诗学”试图超越原子式现代主义，建立个人与历史、时代的精神关联，赓续传统又有所创新，重构作品的精神潜能。

为追寻诗歌充分的现代性和最大的自由化，西川创作了《致敬》《鹰的话语》《鉴史》等系列散文诗。2004年，他借用传统相声“贯口”的表现形式创作了《小老儿》：

小老儿小。小老儿老。小老儿一个小孩一抹脸变成一个老头。小老儿拍手。小老儿伸懒腰。小老儿到我们中间。小老儿走到东。小老儿走到西。小老儿穿过阴影。小老儿变成阴影。小老儿被绊倒。小老儿也绊倒别人……^[18]

这首散文诗共12节，节奏流转有弹丸之妙，给人以音韵之美。诗句语义飘忽滑行，“小老儿”仿佛是一个实体，又犹如一缕游魂，抑或是一种流行病毒，又似乎就是当下的你我。西川曾解释说灵感来自非典疫情，照此解读，“小老儿”可能暗示四处传染的病毒，也可能泛指文明病的症候。该诗用传统的语言形式构成德里达意义上的“非传统文本”，提供古典性与现代性交融的实验文本。诗人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明确的价值尺度，而是通过架设修辞与现实之间的审美桥梁，表明一种倾向、一种态度、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章闻哲认为：“古典的符号无时不刻不充满着现代时空，尽管它在自身体系中是明晰的，但现代技术却可以通过各种象征、各种代指、引用和历史情节的移位等修辞手段的中介，来使古典的内容和形式讽喻性地表达现代性的本质问题（政治的、社会的问题）。”^[19]如果没有“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就不会有中国散文诗的充分发育。守正与创新总是互相促进，优秀的诗人善于将现代主义

与古典传统圆融汇通、推陈出新。

新世纪以来，更多的诗人追求有深度、厚度的写作，坚守审美艺术追求的同时，也承担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让诗语抵达时代疼痛，让思想提供智识的洞见。若想让后来者心慕手追，诗人就要根据自己能做什么和时代需要什么，来给自己定任：有时要去探索语言在音乐上的可能性，有时要跟上口语发生的变化，为当下写作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和形式资源，促进文体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散文诗的典范，必然包含抒情者强烈的情感投入，纵深的历史反思与幽微的个人经验的智性结合以及精巧而独特的诗学符号转换。诗人不仅要为时代生活画像，书写现代中国的精神气质，也要为未来指明方向，提供让世界仰望的精神价值。当代作品没有较长时间淘洗，争议在所难免。研究者要有客观批评当代文学的勇气，也要有肯定当下写作的胆识，尤其对尚未经典化的当前作品给出在场的理性评价。虽然同处驳杂的文学现场，评论者也需第一时间给出意见，哪怕失之偏颇，也要为勇于探讨世情和勘探内心的作品提供建议或可能判断。回顾近20年来的散文诗创作，笔者试图通过审美话语和历史现场的研究将散文诗的整体流变与审美重建看得清晰些，但同时又不得不对准那些经典或具有标志性的文本，以使本研究的论述能够立足，这是一个不断有新奇发现的过程，囿于个人的阅读，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 [1] 王光明. 散文诗的世界 [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82.
- [2] 语伞. 外滩手记 [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3-4.
- [3] 杨庆祥. 去掉“一座城”的伪装 [N]. 人民日报，2012-08-05（6）.
- [4] 迈克尔·特鲁. 当代美国散文诗的复兴 [M] // 彭燕郊. 国际诗坛. 张子清，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103.
- [5] 特朗斯特罗姆，著，李笠，译. 特朗斯特罗姆诗选 [J]. 诗歌与人，2011（4）：4-5.
- [6] 卡林内斯库. 现代性的五副面孔 [M]. 顾爱彬，

- 李瑞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36.
- [7] 耿占春. 求索秩序: 新世纪二十年诗歌写作 [J]. 南方文坛, 2020 (6): 36-41.
- [8] 爱斐儿. 非处方用药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1: 115.
- [9] 谢冕. 盛大华美的大地交响曲: 一个传统文体的拓展与延伸 [N]. 文学报, 2021-12-02 (8).
- [10] 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 [M]. 张月, 石向骞, 曹元勇, 译. 郑州: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9: 154.
- [11] 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 詹姆斯·麦克法兰. 现代主义 [M]. 胡家峦,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301.
- [12] 李健吾. 李健吾文学评论选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249.
- [13] 周庆荣, 箫风. 保持温度, 坚持温暖, 拒绝绝望: 周庆荣访谈录 [N]. 文学报, 2014-09-25 (3).
- [14] 周庆荣. 沙漠上的烈士 [N]. 兰州晚报, 2020-11-19 (8).
- [15] 陈德根. 打工: 一个疼痛的词语 [J]. 散文诗世界, 2009 (6): 58.
- [16] 黑陶. 一个关于中国的隐喻 [J]. 扬子江诗刊, 2006 (5): 51-54.
- [17] 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M]. 张旭东, 魏文生,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4: 124.
- [18] 西川. 我和我: 西川集 (1985-2012)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3: 156.
- [19] 章闻哲. 散文诗社会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5: 279.

Aesthetic Pursuits of Chinese Prose Poetry in the First 20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ZHANG Yi

(Foundational Course Department, Fujian Police College,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first 20 years of the new centu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cademic focus. Prose poetry, as a new style, has experienced a hundred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accumulation in China, and finally some new elements have occurred, gradually establishing the stylistic quality and aesthetic confiden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prose poetry reflects the multi-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of modern society through the surge in rhetorical ability,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all for a truly powerful spiritual structure, and presents the miscellaneous and subtle life experience and spiritual world of Chinese people. Reviewing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prose poetry creation is intended to reflect on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current poetry creation and find spiritual and formal resources for prose poetry creation.

Key words: prose poetry; aesthetic pursuit; poetic return; Chinese temperament;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